

略论当代文艺的家国叙事

张志忠

中国当代文艺 60 年思潮波浪汹涌,乱花迷眼,如何处理家与国的关系,即家国叙事,始终是它的一条甚为重要的主线。60 年间的社会生活经历了诸多的跌宕起伏、沧海桑田,它的许多变迁也都是通过国家、家庭与个人的关系的调整而表现出来的。

赵树理的《登记》、《三里湾》,欧阳山的《三家巷》、《苦斗》,到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从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谢晋的《芙蓉镇》,到张炜的《古船》,张艺谋的《高粱》;从 90 年代初期的电视连续剧《渴望》,到 21 世纪的以《中国式离婚》、《金婚》等为代表的大量家庭伦理剧——检索 60 年的文学艺术史,我们发现——家庭,一直是当代文学艺术作品非常普遍、同时也卓有成就的表现对象,而家国叙事,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基本模块。

就社会现实而言,20 世纪的中国,在追求现代性,实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的历程中,需要花很大力气去处理的,就是如何重新整合、动员全民族所有能够调动的资源,从根本上更新和调整国家、家庭和个人的关系。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穿越数千年的风云而绵延不绝地维护了自己的文明形态。各种原因中,中国文化中的家国同构,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方面,封建君主制国家权力关系自上而下层层推展和授受,是以家庭关系与伦理为矩范。另一方面,修齐治平的个人理想,是行为规范自下而上的攀缘和归附。总之,治理国与家的法则是相同的。同时,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中,家庭又是从事生产劳动和财富积聚的最小单位,造成人们对家庭的特别依赖。甚至最为个性化的婚姻组合,也必须依靠“父母之命”,由家长作主。这样的家族制和家长制主导的几代人同居的家庭,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社会中血缘最亲密、联系最紧密的基本组成单位,也是传统的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基本要素。现代性的两大要义,一是个性的解放,实现民主与自由,二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两者都需要摆脱旧的家族式家庭体制。个人要挣脱家族的宰制,获得最大限度的个人自主权,国家要消除族长和家长的权威而确立国家的权威,与个人之间建立直接的关联性,以便实现最大的行政效益,将其意志贯彻到社会的每个成员。因此,20 世纪中国的社会变迁,在许多时候,首先就是家庭关系的重组。通过对家族制和家长制的颠覆,完成对旧的社会体制的瓦解,并且将个人直接组合到现代国家的需要之中,并且由此引发普遍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变动,进而影响每一个社会成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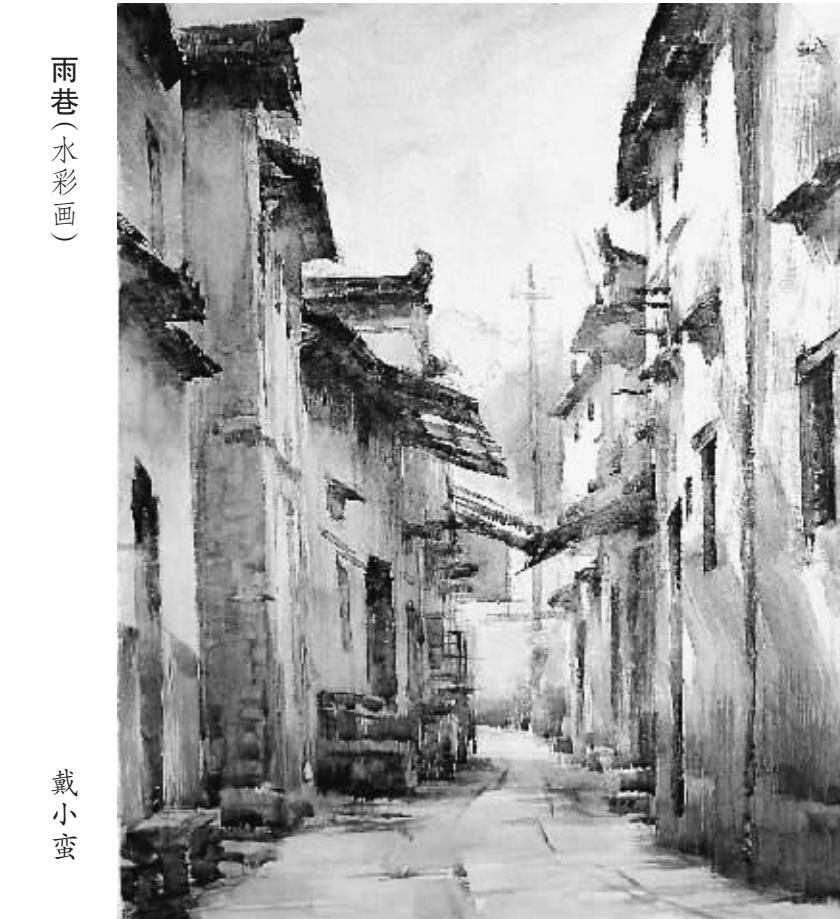
就文艺创作而言,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时期所产生的家庭伦理的震荡和个人选择的困惑,成为文艺家们取之不尽的灵感渊源。这既是因为,中国传统大家庭的错综复杂,其内在的矛盾

冲突,形形色色,给文艺家们以丰富的启迪。同时,文艺要诉诸人们的普遍情感,触动人们的敏感心灵,家庭内部的冲突,无论是日常生活中的家长里短杯水波瀾,还是时代巨变中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都是最具有普泛性和形象性,是文艺作品的受众之感情最容易被打动的最大公约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关于家国叙事的大量作品,也成为中国当代文艺的非常重要的传统。

1949 年以来的文艺创作,具有了新的时代特征,这就是,不但要走出封建式的大家庭,也要走出现代意义上的以夫妻为主的核心家庭,直接走向革命斗争和生产劳动的第一线,直接听命于国家的需要和召唤。杨沫《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但不要冲破封建气息浓重的父母掌控的旧家庭,也要走出她和余永泽建立的温馨的小家庭,才能够投身于民族解放的艰苦斗争,焕发出青春的光辉。赵树理笔下的“小飞蛾”、“张木匠”(《登记》)、“糊涂涂”、“常有理”(《三里湾》)、“吃不饱”、“小腿疼”(《锻炼锻炼》),这样一群大大小小的农村家庭的“家长”,在新的民主平等的时代,却顽固地维护家长制的特权,支配年轻人的生活。这充分地说明,封建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和旧的生活方式的保守封闭,它对新的时代要求的阻碍作用,就像“小飞蛾”那样,自己身受封建办婚姻之苦,抱憾终身,却又险些把女儿艾艾推向办婚姻的火坑。当然,在旧式的家庭迅即瓦解的同时,一种新型的家庭关系也在建立起来。冯德英《苦菜花》中那位受到儿女影响而日渐革命化的母亲,表现出中国穷苦妇女的觉醒和厚爱。电影《白毛女》中的喜儿和大春,在灾难重重的年代被迫分离,在翻身解放的时代幸福团聚,这既是“三言二拍”以来中国白话小说中患难夫妻聚散离合故事的经典模式,也是作品主题“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精彩显现。卢新华《伤痕》中的女知青王晓华与母亲关系的破裂与弥合的悲剧,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中两个家庭的瓦解与重组的喜剧,对“文革”和改革年代,分别进行了深入动情的描绘。

在长达 60 年的家国叙事中,以国为家、忘我奉献,是一以贯之的主题。随着现代转型的深入,市场化时代的注重经济效益,带来个人生存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加剧,也消解着家庭内部的情感纽带,例如计划经济时代难以想象的下岗和失业,例如住房问题、医疗保障和养老问题的凸现,“空巢”老人,单亲儿童,丁克家庭,乃至第三者插足带来的婚姻危机,都是新的社会现象。为了应对这些危难,许多时候都要依靠家庭的相互支持、“抱团取暖”,家庭的稳定和亲情的重建,也成为 90 年代以来文艺创作中的重要

方面。《渴望》中的刘慧芳,正是以含辛茹苦、克己忍让的家庭伦理,赢得了无数同情的眼泪。重新讲述父亲母亲的故事,唤起子女一代对父母一代经历的艰难时世的了解、尊重和同情,似乎成为时尚的潮流。电影《我的父亲母亲》,从女儿的眼中展现出乡村母亲与右派父亲的生死苦恋;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和《闯关东》,在某种意义上,和《雷雨》、《财主的儿女们》相似,都是讲述在财富事业上的“成功人士”的家庭故事。可是,不同于曹禺、路翎所写的子女们对父亲的反叛和毁灭的悲剧,这两部作品中的着力点,在于这两个商业家族的“创业艰难百战多”,在于父亲一代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辉煌业绩和子女们的继往开来、发扬光大的壮举。



雨巷(水彩画)

戴小蛮

我把赵玫的长篇小说《漫随流水》认定为浪漫主义的“成长小说”。当然,它是一部主人公沈萧“成长”得不怎么顺利的成长小说。或者如作者所言,她没有长成白天鹅,却长成了黑天鹅。作为一个文学形象,她是可爱的、可亲近的。

所谓成长小说,我把小说的开头,视为沈萧的成长的出发点。这时她是个高中学生,少女阶段就要结束、青年阶段即将开始。不错,在相当多的成长小说里,这个年龄段已经是“成长”的终点了。但这时的沈萧,遇到的是“正常情况”以外的情况,她此前所受的教育,包括家庭、学校、社会和自我的教育,本来就不足以形成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而突然降临的社会风暴,又把原来就不足为凭的认识也彻底颠覆了。即使在小说的叙叙里,沈萧此前的经历也是模糊的,少到不能再少,虚到不能再虚。发生在邻居萧伯家的两条人命的血案,等于对沈萧此前的一切进行了一次“归零”,让沈萧从这个“零点”出发,开始她的“成长”。

实际上,沈萧此前所有对这个世界的认识,都无法让她对这个两条人命的血案做出合理的认知。通用价值的判断标准仍然在起作用,但是它不起作用的过程中,却自我证明着它的无效性。这使得原本清晰的判断变得模糊了。失去了尊严的生命还有没有

新的时代语境下,文艺作品的家国叙事,也出现了值得重视的偏差。比如在否定了阶级论和血统论盛行的年代,鼓励青少年人与身为“阶级敌人”或者“走资派”的父辈划清界限的倾向之后,国家叙事中,曾对历史上一些极权专制登峰造极的君王,塑造为盛世明君,进行无限制的赞颂和褒扬,或为了家庭的稳定而放弃个人的个性和情感的追求,再一次将妇女置于弱势群体的地位。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值得让人们为之警觉。



流行歌曲的评优标准可以有多项,但最重要的一项是“流行”。没有流行的“优秀”流行歌曲是不能使人信服的。有人说只要专家们推荐,有媒体的宣传,“流行”不成问题。事实并非如此。央视春晚每年都推出若干新歌,但从 1999 年《常回家看看》广泛传唱以来,让人常常惦念、曲不离口的究竟有几首?可见,媒体的宣传也并不是万能的。所以流行歌曲评奖活动,科学的运作应该在歌曲流行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

流行歌曲的“流行”主要指在大众间的流行。千千万万人的传唱与组织一些人为某首歌评分,这是两回事,不能同日而语。在通常情况下,词曲作者和歌手创作流行歌曲,首先想到的是流行,要追求通俗、简单、上口、动听、易学,得到众多群众的掌声。如果是为了参赛获奖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调动评委专家们的胃口,如何战胜竞争者。必须露一手,锦上添花,显示自己实力。为此写的歌曲必然要复杂一些,有一定难度,于是离大众就远了。如果换一种思路,将有限的资金用

一部浪漫主义的“成长”小说

——读赵玫新作《漫随流水》

陈冲

这样的命运降临到麦穗身上时,沈萧也就面临了又一次别无选择的选择。她没有选择离开,而是选择了留下,然后是和麦穗一起到了乡下。而且这是一个偏远、闭塞的小村,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绝。于是就给沈萧提供了一个可以扬其所长环境。这个“长”处,说白了也不过是那个趋利避害的天性所衍生的适应能力,再加一点天赋。麦穗放纵情欲造成的村民们本土伦理的混乱,使沈萧再一次面临选择。这一次她相对主动,因为她手里有了一张牌。以她本身的“努力”和“成绩”,她获得了上大学的机会。她回到卫城,进了大学,立刻就开始了“成长”,而且是“疯长”。在那些小市民同学还把她视为一个乡巴佬时,她已经天鹅般从鸡群中站立起来。她先是受到导师洛水的赏识,成了他研究武则天的助手。毕业后被调到市写作组,很快又成为歌舞团团长,这在常人难以企及的一些“成长”情节,只有称之为“突兀”、“奇崛”才合适。在旧有的伦理统统被打碎之后,提供给人们的新的伦理虽然闪闪发光,却无法践行。新伦理的榜样都

是不可学的,而且总是被它的提倡者自身的行为摧毁。这些新伦理的背后都带着明显的社会动机,而社会的变动不居使这些伦理也变幻无常。伦理之所以是伦理,就在于它的稳定性;失去了稳定性的伦理根本就不是伦理。

当一切繁华烟消云散,沈萧重新回到了最初那间地下室的小屋。小屋里已经不再有外婆,但小屋的象征意义一如作品的开头——这儿是沈萧“成长”的起点。她在这儿把自己禁锢起来,同时开始又一个起点,因为她要在这儿完成一部对人性深刻反思、反省的忏悔录。她把这本书定名为《漫随流水》。因为这本书的写作,“她觉出这是一种有质量的生存,并且美好”。她眼看着别人在“随”着新的“流水”向前,自己却坚决不“随”。怎么会这样?谜底就在那部忏悔录之中。等她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别人找出了她这部遗著。厚厚的,由沈萧一针一线亲手装订得整整齐齐。打开来,全是白纸,一个字也没有!是啊,她能忏悔什么呢?你让她拿什么伦理做标准,去对人性做出深刻的反省呢?

循着浪漫主义的轨迹,整部小说至此完成了使命。我们终于发现,无论赵玫让她的主人公选择多少道“流水”,最终,都是为了“漫随”到一个命定的归宿。

以著名作家萧红命名的文学奖项——“萧红文学奖”目前正式设立。该奖由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人民日报出版社和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主办,面向全国和海内外汉语文学作品进行评选。

“萧红文学奖”每四年评选一次。设置三项奖项:萧红长篇小说奖,萧红华语女性文学三项萧红研究奖。萧红长篇小说奖面向全国评奖;萧红华语女性文学奖面向海内外用汉语写作的女作家评奖;萧红研究奖包括萧红和她的作品的学术研究、影视和戏剧创作以及其他与萧红有关的创作,每届每项分别评出 3 部(篇)获奖作品。

萧红文学奖评选工作由“萧红文学奖评奖委员会”承担,聘请国内文学界有影响的作家、理论家、评论家和文学组织工作者组成萧红文学奖评奖委员会。首届评选将在 2011 年萧红百年诞辰纪念日举办。

(董伟)

于赞助广大词曲作家创作,赞助歌手们和演唱团体到大众中去义演,赞助群众歌咏活动和其他展示性演出,各电视台、媒体追踪报道,结果也许会是另一种景象。

目前乐坛出现的一些“怪现象”绝不是一两次“大赛”活动造成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是一系列大型音乐活动的负面效应的结果。我们有必要对近

年来各类音乐大赛活动进行反思总结。例如中央电视台举办的“青歌赛”,已搞了 10 多届,20 余年,影响巨大。它按美声唱法、民族唱法、通俗唱法三类进行评优比赛,形成一种模式为各地各个院艺术团纷纷效仿。诚然它确实丰富了屏幕,培养了新人,繁荣了音乐,功不可没。但这种运行模式效果都是好的吗?很值得反思。众所周知,音乐是情感艺术,它的表现尽管有技术问题,但主要靠音乐内容和音乐形象的塑造。为此它要拥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和各种风格的演唱技艺。如果长期只举演唱技艺的旗帜,长期突出三种唱法,形成固定模式,就会背离了音乐本质和其科学发展的规律。

中华文化是包容性很强的文化,中国民族声乐应该有更多的演唱形式和演唱技艺。最近一届“青歌赛”推出了原生态演唱,特别受广大听众欢迎。这反映了听众要求突破现有固定模式,渴望民族声乐多样化的心情。不过如果继续搞原生态演唱比赛则未必科学,因为原生态演唱需要保护其原汁原味,拿来比赛势必改编,就会破坏原生态。如果搞新民歌演唱比赛可能要好一些。

希望音乐界和广大通俗音乐爱好者,注重科学思维,实事求是地按音乐自身发展规律办事。只有把广大群众的需求和爱好摆在第一位,让大众自觉自愿地爱听爱唱,才能让流行歌曲真正流行起来。



文艺点

汶川特大地震带来无数泪水,因为悲伤,也因为感动。女作家孙晶岩在地震当月深入地地震现场,辗转灾区各地一个月,采访人物百余人,酝酿再三,完成了报告文学《震不垮的川娃子》(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以可触可摸的文字记录了超越惨烈灾难的不屈人性。

报告文学写作不仅需要智慧和才情,也需要勇气和体能。孙晶岩巾帼不让须眉,主动向中国作协请缨,奔赴地震灾区采访三次。从地震发生的当月下旬开始,辗转震区各地一个月,记写笔记 8 本。北京出席抗震救灾表彰会后,春节前夕作者又回访灾区,看望作品的主人公。正是依凭了这样认真的带着敬畏之心的虔诚采访,作者对地震与地震中的人有了更为真切的观照和感受,并且从中获得独特的发现,最终成就了这部独具特色和价值的报告文学。

作家选择川娃子为作品的主人公,直观而言,这体现出女性作家对于题材处理的母性自觉。地震中川娃子的勇气、大气、静气、正气、智慧、真

情和纯朴,深深地打动、强烈地震撼了作者。孙晶岩从自己经历过的真实存在中,从“震不垮的川娃子”看到了中国青年少年是“垮不掉的重大命题,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中华民族生生不已的希望所在。孙晶岩说,“5·12”大地震”成为中国青少年一代的成人礼”,这是我们理解作品主题的关键词。可以说以此把握对象,并且鲜明地凝练这样的主题又能强化对它的表达,使作品在地震文学中,具有了某种能够抵达对象精神本旨的优长。

作品中,18 个少年的形象跃然纸上,他们可敬、可爱、可亲。灾难当头,他们责任在肩,临危任事。“家中唯一的男子汉”郑小鹏,地震中幸运地“虎口逃生”。但躺在安全地带,他“心里不安”,“第一个站起来,向危机四伏的学校跑去”营救老师和同学,“头碰破了,鲜血直流,手划破了,脚扭伤了,可他全然不顾”……作者笔下的人物勇敢坚强,天真可爱。作品用真诚的笔触谱写了少年英雄的精神塑像。

多难兴我邦,困厄少年立。震不垮的川娃子不仅成为同龄人的精神偶像,而且也能同样值得我们成人学习,“在这里你也能看到人性的闪光,学到平时学不到的东西”。

“中影集团电影惠民”系列公益活动日前在北京启动。中影集团计划从 2009 年 7 月开始一年内,陆续向四川地震灾区及部分老少边地区免费赠送农村数字公益电影,活动范围覆盖全国 26 个省市,累计捐赠场次将达 30 万场。

在集中推广优秀国产影片的同时,中影集团将以多种形式,赴全国各地的城镇社区、学校和部队、农村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等,进行公益放映,捐赠场次、拷贝,捐赠放映设备;活动分为“千里行”、“灾区行”、“京郊行”、“军营行”、“社区行”、“老区行”、“边疆行”、“校园行”等 8 个系列。同时中影集团将举办迎接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影片展映和大型群众性影评大赛等活动,让“电影惠民”真正施惠于民。

(舒平)

中影启动「电影惠民」活动



中影惠民

“情系农村,共创文明”——《中国作家》“新农村专栏”座谈会”在京召开。

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民政部、中央文明办、中国作家协会等六部委启动“情系农村,共创文明”系列文化公益活动开展,从今年元月号起,《中国作家》“新农村专栏”,专门发表农民作家的原创文学作品和反映新农村建设的纪实文学作品。与会者认为,这既是文学对当下的介入,对现实的责任,也是扩大表现内容的延伸,无论是对于文学或者刊物来说,都有重要的意义。(朱竟)

《中国作家》研讨新农村专栏

黑龙江设立「萧红文学奖」